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戊戌变法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也是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积二十年之功，在第一时间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上，上下求索、四海搜罗，运用丰赡而可靠的史料来鉴识伪说、辨明历史真实，先后出版《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》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》《从甲午到戊戌：康有为〈我史〉鉴注》《戊戌变法的另面：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四部书。

戊戌变法120年之际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将这四部书汇刊为《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》，集中展现新时期史学界戊戌变法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《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》出版

1998年，正值戊戌变法一百周年，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茅海建结束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，开始转向戊戌变法。他不断往返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、日本外交史料馆等地，重新阅读戊戌变法相关的全部档案史料，力图建立相对可靠的史实，从这一基础上展开逻辑思维，即“史实重建”。他将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，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、过程、原委，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，用七年时间完成《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》一书，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，引发学界关注。

六年之后，茅海建出版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》。在连续13年的研究中，他发现戊戌变法“很可能是一偶发事件”，其发生、发展、结局充满变数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很可能就存在于那些历史细节中，因此对细节的考据更具有价值。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》再次从历史细节入手，层层揭示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幽微隐秘与真实意义，内容涉及“公车上书”的背后推手，戊戌前后的“保举”及光绪帝的态度、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、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、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、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、康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、康有为《我史》手稿本之考察等。

在研究过程中，茅海建深感戊戌变法主角之一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《我史》屡有夸饰和作伪，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，康有为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，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、修改时的内心世界，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。“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，他为什么要作伪，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。”2006年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看到《我史》的手稿本，便对其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，约25000字内容进行鉴注，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，完成《从甲午到戊戌：康有为〈我史〉鉴注》一书。



着手研究戊戌变法10年之后，茅海建阅读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“张之洞档案”，不由又有了“牖开思进之感受”，通过对这批史料的研究写成了《戊戌变法的另面：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。众所周知，多数学者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，主要依靠康有为、梁启超留下的史料，并进行了多次辨伪求真，建立起所谓历史的“正面”，但是“张之洞档案”又给我们提供了戊戌变史实结构的“另面”——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。“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，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，本来是不言而喻的；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，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，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，能够阅读到历史的‘正面’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‘另面’的机会并不多。”茅海建深感幸运。

最近几年，茅海建的研究注目于“大同三世说”。戊戌变法前，康有为完成了两部理论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一些研究者将此作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基础，而茅海建认为，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一般轨迹来看，“新学伪经”“孔子改制”属思考的过程，并非结论。梁启超在戊戌之后宣称，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已有“大同之学”，但因康在《大同书》写作日期中“倒填日期”，此说并不被研究者重视。茅海建从康有为的著作中找到了“大同三世说”的基本线索，并从梁启超的著述中得以验证，再从康有为的其他学生著述中得以再确认。“大同三世说”与康有为后来的《大同书》有较大的区别，康有为称其是由孔子创造，藏匿在《春秋》《易》《孟子》等经典之中，最终被康所发现，提示了人类社会从据乱到升平最后到太平的普遍规律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茅海建 著
《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》(全四册)

从1986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首部中篇小说《北极村童话》，到今年出版《候鸟的勇敢》，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迟子建共发表了五十多部中篇。致力于书写东北的迟子建，在新小说中继续钟情于自己生活的黑土地与黑土地上的人物，从中发现当下生活里人们面临的焦虑、矛盾、欢笑、坚忍，探讨自然生态的潜在威胁、人际关系的复杂、贫富差距造成的心理错位等问题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迟子建 著
《候鸟的勇敢》

书写自然界，启示人类社会

2002年5月爱人的去世，对迟子建而言是“与生命等长的伤痛记忆”。经此创痛，迟子建多了“沧桑感”。一直到写作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迟子建开始具有“将自己融入人间万象的情怀”，和大众之间的阶层阻隔和心灵隔膜被打破和拆除。作家蒋子丹认为此时的迟子建“对个人伤痛的超越，使透心的血脉得与人物融会贯通，形成一种共同的担当”。

迟子建写《候鸟的勇敢》时所居住的家，正对着哈尔滨的新区群力外滩公园。书中写的东方白鹤，是多年前她与爱人一起看到的。白天她写小说，跟候鸟打交道。黄昏散步，她看到的又是候鸟。小说与现实产生了完美的映照。尽管现实中她是一个人生活，但写着写着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生活。“笔下的人，就在我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可能放下酒杯到厨房的一刻，就能感觉到人物的背影。我在迈过这个门槛去倒垃圾的时候，我可能感觉到德秀师父就像我细节里面写到的，她拿着一个半湿的毛巾去擦那个门槛。这些人和我产生了一种共融。”

小说三四个月就顺利写完了。时值哈尔滨的深秋，万物萧条。但她再去散步的时候，夕阳

离她很近很近，“我有一种很苍凉的感觉。完成一部作品，就好像爱上了作品里面的人物，并与他们朝夕相处几个月，像一场恋爱一样，你告别了你特别想和他在一起生活的人，也有些许的伤感。”

《候鸟的勇敢》以候鸟迁徙为背景，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。金瓮河自然保护区的张黑脸曾在一次扑灭山火的战斗中与队友失散，遭遇猛虎，他被吓昏过去，幸亏有一只神奇的白鹤使他躲过一劫，自此，他变傻了，心却与候鸟特别亲近。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里凡心不灭的尼姑，有一种与自然契合的淳朴之美。张黑脸的灵性慢慢苏醒过来，他和尼姑德秀相爱，并救护了一只受伤的白鹤，让它与伴侣一起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飞去南方，但这对白鹤最后未能逃脱命运的暴风雨，而埋葬它们的张黑脸与德秀师父，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，也找不到来时路。

迟子建将小说命名为“候鸟的勇敢”，既是神话象征，也是小说叙述的法器。从那对东方白鹤来说，它们最终携手飞离金瓮河，却中途死在暴风雪中，体现了它们爱的勇敢；从人的角度，德秀师父与张黑脸冲破世俗和宗教羁绊的爱情，也是一种勇敢。

关注小人物，探讨人性迷失

出生在东北并且长期致力于书写东北的迟子建，热烈而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。踏入文坛之初，迟子建便是以笔下的“北极村”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，之后的小说作品《伪满洲国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《群山之巅》等，笔墨辗转于乡村与城市，但始终不曾离开她深爱的热土。《候鸟的勇敢》既写出了东北的落寞，也写出了东北的生机。小说触及东北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，比如人情社会与体制迷思，又将“有情”藏匿在东北严峻的社会现实背后，红尘未了的德秀师父，老实憨厚的张黑脸，他们因孤独与善良而相拥的情感。这些人事、情事、心事融汇到东北莽林荒野中，汇聚成迟子建的文字力量。

无论哪一种题材，迟子建都热衷于书写黑土地上的人物形象，关注他们的世俗生存状态，赞扬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乐观的品质，用宽恕之心来对待他们的自负、狭隘等弱点，用爱意抚慰他们生活的苦难和不幸，用温情批判他们人性恶的抬头。

《候鸟的勇敢》中，保护区管护站站长周铁牙暗地里贩卖

野鸭牟利，贿赂有权有钱的人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禽流感袭来，人人都成了“惊弓之鸟”。此时，高官父亲却碰巧吃了野鸭，被怀疑为禽流感；城里的富人怀疑自己被传染，住进了医院，最终两人都不治身亡。尽管两人确诊都不是禽流感，但在当地候鸟却已经成了伸张正义，惩奸除恶的象征。私欲与权力暴露出人性的丑陋在迟子建笔下浮现出来。

在巨大的诱惑与无尽的欲望面前，人性之善还能护卫我们的精神家园吗？人类是否能够从自然获得启示，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精神迷途？《候鸟的勇敢》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，如她自己在小说的后记中所言：“我们面对的世界，无论文本内外，都是波澜重重。夕阳光影下的人，也就有了种种心事。所以《候鸟的勇敢》中，无论善良的还是作恶的，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，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，多处于精神迷途之中。我写得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，就是结局，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，没有逃脱命运的暴风雨，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，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，却找不到来时路。”

《候鸟的勇敢》书写现代人的精神迷途